

我们合理的信仰

四卷本《改革宗教义神学》缩写本

Our Reasonable Faith

Herman Bavinck
[荷] 赫尔曼·巴文克 著
赵中辉 译

基于信仰的深刻表达，深厚学术修养的精彩呈现

南方出版社

我们合理的信仰

四卷本《改革宗教义神学》缩写本

Our Reasonable Faith

Herman Bavinck
[荷] 赫尔曼·巴文克 著
赵中辉 译

南方出版社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30-2010-15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合理的信仰/(荷)巴文克著;赵中辉译. —
海口:南方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5501-0014-5

I. ①我… II. ①巴… ②赵… III. ①加尔文宗-教
义 IV. ①B97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248697 号

Our Reasonable Faith by Herman Bavinck 赵中辉 译
本书由改革宗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

书 名: 我们合理的信仰
作 者: (荷)赫尔曼·巴文克
译 者: 赵中辉

出 版 人: 赵云鹤

出版发行: 南方出版社

地 址: 海南省海口市和平大道 70 号

邮 编: 570208

电 话: (0898)66160822

传 真: (0898)6616083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九天志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印 张: 29.25

字 数: 53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7

书 号: ISBN 978-7-5501-0014-5

定 价: 38.00 元

1 刷

你不可不知的巴文克^① | 英译者序 |

凡熟悉荷兰改革宗教会——就是与 *Hervormde* 不同的 *Gereformeerde* 教会——历史的人都知道，从 1834 年的大分裂 (*Afscheiding*) 和 1886 年的不妥协运动 (*Doleantie*) 中诞生的继承人里，有两位声望无出其右的人物——凯波尔与巴文克。他们在基督教世界可谓声名远扬，功高盖世。二人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所做的工作，必须被视为上帝对欧洲和新世界传统基督教的特别祝福。

作为荷兰改革宗事业的勇士，二人常常被后人同时提起，并加以比较、对照。有人这样论述他们之间的区别：“凯波尔是一位火花闪耀的天才，巴文克是一位才思敏捷的天才。”第一位为巴文克撰写传记的作家兰维尔 (*Landwehr*) 牧师将他们另做一番对照，说：“巴文克属亚里士多德，凯波尔属柏拉图；巴文克概念清晰，凯波尔思想丰富；巴文克在历史的传承上阐述，凯波尔靠直觉进行推测和扩展；巴文克主要是归纳性思维，凯波尔主要是演绎性思维。”19 世纪二人在研究加尔文神学方面的成就在荷兰文化和思想界的复兴中，可谓相得益彰。

巴文克出生于 1854 年 12 月 13 日。1954 年，在他百年诞辰时，荷兰各地举行了广泛的纪念活动，高度赞扬他所做出的贡献。巴文克出生在尊特 (*Drenthe*) 省胡格文 (*Hoogeveen*) 镇，祖籍本泰姆 (*Bentheim*) 县。他的父亲让·巴文克 (*Jan Bavinck*) 牧师为了坚持传统基督教的纯洁传统，于 1834 年脱离了荷兰国立教会。

年轻的巴文克在兹沃勒 (*Zwolle*) 中学读书时成绩优异，后来进入自己教会在坎本 (*Kampen*) 开办的神学院。他在这里只待了一年，然后便到莱顿 (*Leiden*) 神学院进一步深造神学。莱顿至少给予巴文克两大祝福：

① 题目为出版人所加，原书无。

第一，重视学术；第二，掌握受自由派影响的现代神学的第一手资料。这两大祝福对巴文克大有帮助。在他的一生中，进行坚定的正统改革宗神学研究的想法占据极高的地位。他对新兴的神学思想耳熟能详，这不仅使他更加笃信加尔文主义，而且也有助于他的神学研究，使他能很实际地处理当时的各种问题。

1880年巴文克从莱顿神学院毕业，其毕业论文的主题是慈运理的伦理观。毕业后他在法兰内克（Franeker）地区牧会一年，之后被任命为坎本神学院的教义神学教授。他就职演说的题目是《神圣的科学》（*De Wetenschap der Heilige Godgeleerdheid*, 1882），那是一个让他终生着迷的主题。在坎本神学院的十年里，他勤奋研究，教学富有成效。这期间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三次请他执教。收到第三次邀请后，他在良心也不受谴责的情况下（即没有使他秉持的教会神学教育的完整性受到破坏），才于1902年接受了这个邀请 [见巴文克的《谢绝还是接受》（*Blijven of Heengaan*），坎本，1902]。巴文克在凯波尔辞掉阿姆斯特丹的教授职位前往海牙任政府首相之时，接替了凯波尔在自由大学的职位。

巴文克主要是一位神学家，一位教义神学家。他的力作是四卷本的《改革宗教义》（*Gereformeerde Dogmatiek*），这是他在坎本的成果，于1895年至1901年间面世，并于1906年至1911年间修订之后继续发行。韩瑞森（W. Hendriksen）博士编辑、翻译了其中的一卷《上帝论》（*The Doctrine of God*），于1951年在美国密歇根州大瀑布城出版发行。现在这本《我们合理的信仰》（*Our Reasonable Faith*），在1909年荷兰文以《上帝奇妙的作为》（*Magnalia Dei*）出版，是《改革宗教义》四卷本的概要。《我们合理的信仰》并非很专业、很学术，比《教义》通俗，并有更完整的圣经经文索引和注释，不过它和那部更恢宏的作品一样，都是一本论述基督教基本教义的书。它清晰准确地呈现了圣经教导的基本教义。

有人说，巴文克的哲学强于他的神学。他的神学作品的确展示出一位训练有素、学识渊博的哲学家风采，但是，他在自己的教义中首先要做到的是一个圣经的神学家。正如兰维尔所说：“就像加尔文从圣经中汇集自己的思想一样，巴文克也总是从圣经中汲取养分，以圣经为指导，使自己的思想系统化。”此外，在他教授神学的过程中，他并非一个中立的旁观者，事不关己地观望宗教现实。他在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所做的题为《宗教与神学》（*Godsdienst en Godgeleerdheid*, 1902）的就职演说中说：

宗教就是敬畏上帝。它必须是激发一切神学研究的因素。它必须是科学的脉搏。神学家就是敢于论说上帝的人，因为他说的出于上帝、经由上

帝。从事神学研究就是做圣工，就是在上帝的家中做祭司的工作。这本身就是敬拜，用头脑和心灵的圣洁来荣耀上帝的名。

巴文克就是这样开展他的研究工作的。他的学生兰维尔描述当时上课的情景说，由于被真理所激励，巴文克的讲课成了讲道。大多数传记作者都记录了他临终时的话：“现在我的学术已于我无益，我的教义也是如此，唯独我的信仰可以救我。”他在这里不是贬低神学的科学研究生涯，而只是道出了重要性的优先次序。

1925年，当努尔曼（J. C. Rullman）博士向《基督教百科全书》（*Christelijke Encyclopaedie*）递交关于巴文克的文章时，觉得为了更好地描述巴文克的作为，只能援引巴文克在自由大学的同事基辛克（W. J. Geesink）博士的话，他别无选择。这段引文也全文照录在这里。基辛克写道（当然他是用荷兰文写的）：

作为教授，巴文克在任何大学都是顶级的。他学识渊博、博览群书，因此讲课游刃有余。身为敏锐深刻的学者，他有发现问题的天赋。当他发现一个问题时，便会坦诚地将问题传递给听众。如果有了答案，他会与众人分享，绝不急躁，而是审慎地、安静地分享；如果还没有答案，他会竭力探究，去伪存真，绝不会顾此失彼。此外，虽然他重视逻辑，强调学院式的透彻训练，他也非常清楚非理性主义的危险，因而总会承认有些问题没有答案。

作为职业神学家、教义学家，巴文克回到加尔文的改革宗神学。他一面这样做，一面也对现代学术与科学进行有条件地批判性考量，从而促使改革宗神学脱离1750年以来的生硬、僵死状况……像奥古斯丁一样（他并未脱离奥古斯丁的时代背景来考量），巴文克也从启示的哲学寻求人生与世界问题的答案，一个既能满足人心也能满足头脑的答案。

巴文克一生著述颇丰，涉及宗教与神学、哲学与应用伦理学，尤其是心理学和教育理论。在兰维尔的记载中，他已发表的作品大约有六十多部，除了长篇巨著外，还有大量的就职演说、神学院讲话和其他学术性演讲，但不包括他难以计数的专栏文章。在宗教与神学领域，除了《改革宗教义》、《我们合理的信仰》外，还必须提到下面一些著述。1888年，他出版了论及普世基督教合一的经典之作《基督教的大公性与基督的教会》（*De Katholiciteit van Christendom en Kerk*）；1894年作了题为《普遍恩典》（*De Algemeene Genade*）的讲座，这个主题最先由加尔文提出，凯波尔将之发扬光大；《赞美的祭》（*De Offerande des Lofs*, 1901）是他的灵修精品，在生前重印了六次，并被译成英文，于1922年在美国出版；同年还出版了其

姊妹篇《信仰的确据》(*De Zekerheid des Geloofs*)；1911年发表的题为《现代主义与正统信仰》(*Modernisme en Orthodoxie*)的演讲稿和1903年的《呼召与重生》(*Roeping en Wedergeboorte*)，也是他的重要篇章。

他更具哲理性的书有：1908年在普林斯顿磐石讲座的讲义，次年以英文出版，题为《启示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Revelation*)；《当今伦理思潮》(*Hedendaagsche Moraal*, 1902)以及两篇1904年的哲学讲座稿，题为《基督教哲学》(*Christelijke Wetenschap*)和《基督徒的世界观与人生观》(*Christelijke Wereldbeschouwing*)。始终萦绕在巴文克心头、也是他思考得最成熟的主题之一，就是宗教与学识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一个正统的基督教高等教育机构会忽视他对这个问题所发表的诸多著述，如《宗教与神圣》(*Godsdienst en Godgeleerdheid*, 1902)、《教育与神学》(*Opleiding en Theologie*, 1896)、《神学博士或神学教授的职责》(*Het Doctorenambt*, 1899)、《学识与哲学》(*Geleerdheid en Wetenschap*, 1899)、《教会的权威与科学的自由》(*Het Recht der Kerken en de Vrijheid der Wetenschap*, 1899)、《神学院与自由大学》(*Theologische School en Vrije Universiteit*, 1899)等。

巴文克在他执教生涯的后期，尤其注意生活与思想中的两个领域，即应用伦理学和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的心理学。他在前一领域里值得注意的著述有：《妇女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De Vrouw in de Hedendaagsche Maatschappij*, 1918)、《基督徒家庭》(*Het Christelijke Huisgezin*, 1908)、《在现代生活中效法基督》(*De Navolging van Christus in het Moderne Leven*, 1918)、《战争问题》(*Het Problem van den Oorlog*, 1915)、《基督教、战争及其国家联盟》(*Christendom, Oorlog, Volkenbond*, 1920)，等等。这最后一本书提醒我们，对我们这个世纪的问题，巴文克的兴趣是何等广泛。的确，我们必须说，巴文克对“自己所处的时代认识很深刻”。这部分解释了他对心理学和教育原则的卓越建树。1915年他的专著《论潜意识》(*Het Onbewuste*)出版，1897年《心理学原则》(*Beginnelsen der Psychologie*)出版，1920年《圣经和宗教心理学》(*Bijbelsche en Religieuze Psychologie*)出版。他在教育理论方面的主要著作是《教学法原则》(*Paedagogische Beginselen*, 1904)。难怪他在这个领域的成就会引起相当的关注。哥尼流·雅斯玛(Cornelius Jaarsma)博士的《巴文克的教育哲学》(*The Education Philosophy of Herman Bavinck*, 大瀑布城, 1935)以及范·德·茨维普(L. Van der Zweep)的《巴文克的教学法》(*De Paedagogiek van Bavinck*, 坎本)最能说明这个问题。

巴文克曾两度访美。第一次是1892年，他受改革宗长老会联盟邀请，

参加在多伦多举行的大会，并在会上作了题为“宗教改革对国民与国家道德及宗教状况的影响”的演讲；第二次是1908年，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做了磐石讲座，由此证明他是与凯波尔、华菲德（Warfield）、贺智（Hodge）、奥尔（Orr）等人齐名的现代杰出的加尔文主义神学家。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他远没有凯波尔活跃，他对政治哲学的热忱胜过对政治的热忱。然而，他从1911年起，成为代表南部荷兰上议院的议员，并作为教育专家、顾问尽展才华。他的作品中只有一小部分译成了英文，如《赞美的祭》、《上帝的国》（*The Kingdom of God*）、《启示的哲学》以及小专著《进化》（*Evolution*）等。因此，《我们合理的信仰》是一个重要补充。尚未有巴文克的完整传记出版。不过，在此之前已有三本前奏，即兰维尔1921年的《回首往事》（*In Memoriam*），同年海普（V. Hepp）博士的《巴文克博士》（*Dr. Herman Bavinck*）——该书中所承诺的第二卷从未问世，以及科科（A. B. W. Kok）1945年的《巴文克传》（*Herman Bavinck*）。有相当多的荷兰期刊发表过对巴文克思想的分析研究。在美国，除了雅斯玛博士的书外，还有安东尼·胡克马（Anthony Hoekema）博士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论文，论述了巴文克的圣约教义（尚未出版）。

可以说，巴文克为以圣经为基础的基督教改革宗所作的整个辩护，主要针对四方面的反对势力，其中两个来自改革宗外部，两个来自内部。两个外部的反对势力是现代新派神学和罗马天主教，两个内部的反对势力一种是死气沉沉、徒具形式的纯正信仰派，一种是逃避现实的敬虔主义。他时常有力地抨击所有这些反对势力。例如，他曾满怀深情、极富洞见地号召所有基督徒积极地投身世界，不要逃离世界，离群索居地逍遥遁世。他说：

我们不要脱离世界。我们不想脱离，我们也不能脱离，除非我们否认真理的绝对性。当然，天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天国的确要求这个世界的一切都为之服务。天国是独一的、忌邪的，它不允许世界有任何独立的、中立的国度与它并列存在。如果任凭世界自行其道，我们只追求逍遥遁世，其实要容易得多。然而，我们不应当如此偷闲，因为一切受造物都甚好，不得予以拒绝。既然一切都因上帝的道与我们的祷告成为圣洁，我们就当以感恩的心来接受；如果拒绝，就是忘恩负义，就是错判或藐视上帝的美意和恩赐。我们的争战只可能针对罪。因此，基督的门徒无论处于如何复杂的关系之中，无论社会的、政治的、科学的问题如何严重，如何排山倒海般地压过来，如果从争战中退缩，甚至假借基督徒动机之名，认为世界的文化属魔鬼，那就是我们的背信弃义、懦弱胆怯在骄傲地夸口。

这就是巴文克在捍卫自己的信仰时所说的话，是他在做出题为《基督教的大公性与基督的教会》的献词时所发出的声音。这就是巴文克。他接着说：“信心是我们战胜世界的应许。”海普博士恰如其分地写下下面这段话，作为他所写的巴文克传记的结束语：

巴文克曾经说过加尔文的一句话，也同样适用于他自己，那就是：后世“尊荣他们先驱和领路人的最好方法，就是口唱心和地宣告：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永远远”。

亨利·锡尔斯塔 (Henry Zylstra) 谨识

1955年8月

在真道上有根有基^① | 汉译者序

改革宗神学是在 16 世纪抗罗宗运动中发起的，与路德宗有别。两者共同强调点较多，分歧点较少。

路德宗在律法与福音之间缺乏连续性，在救赎论上较改革宗更狭窄。但在许多事上两者一致：对于罗马天主教大公会议在三位一体与基督论上所决定的教义，路德宗与改革宗均与其相一致；在宗教改革的核心信仰（因信称义、圣经权威与反对圣餐变质以及圣礼的数目）上两者均表同意。然而两者在神学与教会的联合上却未能达成协议。

以上帝为中心的教义乃是改革宗神学的主题，这是在圣经中上帝自我启示的要求下发展出来的教义，其重点乃在于三位一体，尤其是强调耶稣基督为中保。改革宗神学与路德宗相异，路德本人为罪得赦免而挣扎，给后人遗留下来的神学集中在因信称义的救赎论上。改革宗在圣经教义中强调彰显上帝至上的主权，这明显是圣经的真理。

人之所以能认识自己，只能从认识上帝而来。上帝在他的话语中借着圣灵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因此我们也承认自己的罪恶与污秽，全然的败坏弥漫于我们的整个人性。这是奥古斯丁主义的人论。因为我们是道德的受造者，我们要向上帝负责任。只有在上帝的亮光中我们才能明白这一点。我们从根本上与上帝疏远，我们真正的归属乃在于我们里头有上帝的形象。

救恩完全是上帝的工作。由于罪的普遍影响，我们乃在上帝的定罪之下，我们不能改变自己的地位与状况。因此，改革宗神学坚决主张上帝在人得救的事上有绝对的主权。救恩的来源乃在于上帝的永旨，他在创立世界以先在基督里拣选了他自己的百姓（弗 1:4），这一拣选与人的任何本性无关。因此，基督道成肉身与赎罪的目的，乃是要救他的百姓脱离罪。他

① 题目为出版人所加，原书无。

的死并不是为了要救赎世上每一个人的罪。若是那样的话，他不是失败，就是走向普救主义，这都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如果那样的话，基督的十字架目前也不能救所有的人，根本上是一无所成，结果就把基督的赎罪大功悬在半空中，凭人对基督信心的支取（信基督即能得救，不信即不能得救，主权在乎人对信心的支取）。因此，基督的死是为了他所有百姓的罪做成的有效的赎罪之工。同样，圣灵吸引我们归向基督，绝无失败。因为我们已经死在罪中（弗 2:1），我们天生不愿投靠基督，故信心完全是出于上帝所赐的。圣灵不但把我们领到基督面前，而且也保守我们在基督里。成圣与保守的整个过程要求我们努力坚定信心，但这努力本身是出于圣灵的恩赐。多特会议上坚持这样的神学观，即坚持蒙神拣选的人不能最终从恩典中堕落而灭亡。

基督教神学中，强调整个的个人生活与集体生活要降服于上帝。改革宗神学所一贯追求的就是照圣经的话来约束我们的全部生活，它总是对福音的集体方面特别强调，并继续受个人主义的影响。

改革宗神学往往被称为“加尔文主义”，这是由于加尔文本人所给予的至高影响。但这并非一种理想的称谓，因为加尔文并未将他的见解强加于人。然而，加尔文的特殊神学即是以圣经解经学为基础的特殊神学。

19 世纪在美洲有改革宗神学的复兴，即查理·贺智与华菲德所领导的普林斯顿神学，在荷兰则有凯波尔与巴文克。凯波尔将他的神学带入政治生活中，创立了一所大学——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创办了一份日报，建立了一个政党，后来又做了荷兰首相。巴文克则为荷兰最著名的神学家，著作甚多。译者以翻译荷兰著名改革宗神学家巴文克之名著《基督教神学》（原名《我们合理的信仰》）为荣。深愿此书能为中国教会带来莫大的祝福，俾使我主内同工潜心研究、造就圣徒，在真道上有根有基，并为此切切地祷告。翻译此书时得到李春旺弟兄、唐娟华姊妹很多协助，于此特表谢忱。本书得以顺利出版问世获荷兰麦恩德夫妇慨助，并希此书可以广为传布，使地极的华人受益。谨于此向他们致谢，愿上帝特别施恩，使上帝之名得荣耀，教会受造。

另外，本书由陈知纲、底波拉、赵刚重新进行校译。在此向他们的辛劳和严谨表示感谢！

考虑到今天中国读者的特定情况，我们适当增加了一些注释，便于理解，是为说明。

赵中辉谨序于美国加州

2005 年 8 月

信仰告白：赞美和感恩之歌

中文版序

巴文克的《我们合理的信仰》（《基督教神学》），是我刚开始对神学感兴趣时就接触到的几本书之一。平心而论，当时并没有觉得多吸引人。随着年岁的增长，现在越来越觉得它的宝贵，甚至在教授神学入门课程时，几乎总是用它来做主要教材。因此，当它的正文简体版即将出版之际，受邀写序来以使中国教会的信徒更好地使用这本书，实在是非常乐意，也是可喜可贺的事。不过因为已经有几篇序言了，特别是全文重新翻译的英译者序，对巴文克已有相当介绍，这里只补充澄清几个问题。

一、真正的敬虔和真正的神学

史上导致巴文克被忽略、误解的原因可能有很多。比如看看从原来荷兰文的书名，到英文翻译的书名，再到中文翻译书名的变迁，就可能一窥端倪。正如前面其他序言中提到的，荷兰原文的书名是《上帝的奇妙作为》。光从名字来看，很难说这是一本温情的灵修作品还是一本冷硬的学术著作。英文翻译成《我们合理的信仰》，就有点往注重理智方面靠拢了。而最后繁体版中文版书名定为《基督教神学》，基本上给人的感觉就是，如果你不是在理性方面特别有追求的基督徒，那就别看了。这恐怕与巴文克的本意正好相反。因为我们知道，这本书是巴文克的浩瀚巨著四卷本《改革宗教义》的缩写本。如果说那套巨著对理智的要求有点高的话，巴文克在缩编本书时，显然是以更通俗、易懂为诉求。

还有一层更深层的原因，是因为巴文克和凯波尔的关系。一般人对巴文克的印象都是在其理智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如在英译者的介绍中，即偏重其学术上的贡献。再加上所谓新加尔文主义者强调文化使命的名声，对我们这些成长于偏重敬虔、注重内在生命成长的传统中的人来说，并没有立即的吸引力。因为一般来说，当人们比较强调学术的时候，神学思想就

容易倾向自由；而在比较保守的传统中，人们更容易显得比较敬虔和注重内在生命。姑且不说这种简单化的联系本身是否正确，即使就按这样的方式来看，巴文克也不是许多人所想当然的那样。要说清楚这点，就要补充交待几句历史背景了。

凯波尔和巴文克是新加尔文主义的两根支柱。但他们各自走到新加尔文主义的路线正好相反。凯波尔本成长于荷兰国立改革宗教会，属自由派神学阵营。但他在神学毕业后的牧会过程中，蒙主带领，回到了历史正统的福音信仰，于是领导了所谓的不妥协运动（1886年）。所以凯波尔比较像是从自由派回转到保守正统，最后定位于新加尔文主义。而巴文克的情况正好反过来，是从保守敬虔的传统中，寻求理智和学术上的进一步阐释时，走到了新加尔文主义。因为国立教会的自由派倾向，早早就导致了1834年的大分裂运动，保守派建立了自己的教会和宗派。巴文克其实就成长于这个更趋保守、敬虔的环境中，因为他父亲就是在这个运动中信主，后来也在这个保守宗派的教会里做牧师。

巴文克从小就在他父亲严格、敬虔的操练下受训，其影响相当深远。神学院毕业后，经过一年多的短暂牧会，就被父亲按立为牧师。后来受邀回到坎本，任教于这个保守宗派的神学院，在那里一教就是近二十年（1883-1902）。当巴文克第三次接到邀请，终于前往凯波尔创办的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任教时，已经是不妥协运动和保守派教会合并组成新的改革宗教会十年之后的事情了。当时，巴文克的四卷本巨著《改革宗教义》已经完成出版。虽然后来有所再版修订，但没有任何重大改变。史学家有时谈到所谓巴文克到阿姆斯特丹以后的转变，其实是他从小地方到大城市以及活动范围和兴趣的自然转移罢了，并不代表他在神学思想上有任何重大变化。事实上，我们或许可以把他后20年在阿姆斯特丹的工作，看做是他前20年坎本教义神学在文化层面的应用，更为恰当。多数人都同意，从神学上来说，巴文克比凯波尔更稳固。

在重新梳理了一下这个时间表以后，现在我们可以说，巴文克的基本神学思想是在彻底保守敬虔的环境下产生的。荷兰的敬虔传统，其实源远流长，甚至到极端的地步。比如至今仍有一息香火传承的门诺会，就诞生于此。而弟兄会的传统，甚至可以追溯到宗教改革前夜，创作出灵修经典《效法基督》的金碧士，就是当时所谓共同弟兄会的成员。宗教改革后与英国清教徒运动媲美的，则是荷兰的第二次宗教改革。与所谓后宗教改革时期新教经院派的刻板形象相反，这些复兴运动在持守正统福音真理的同时，更关注个人实际生命的敬虔和更新。我想要说的是，这其实才是巴文克的基本背景，而他一生的主要时间和工作也都是在这个环境下展开，包括他成熟的神学思想。

明白了这一点，再看本书开篇的第一句话——“上帝，唯独上帝，才是人之至善”，就不太会按理智主义的方向去理解，似乎要在希腊人的思想中辩驳，按敬虔传统，甚至有点神秘主义的思路去理解，才比较对路。至此，当你听到巴文克的“奥秘是一切神学的起点”时，也就不会觉得突兀了。但这并非那种使人骄傲的神秘主义，而是要把人全然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也就是把人的神学全然降服在神的启示之下的“健康的神秘主义”^①。在这里，真正的敬虔和真正的神学就走在了一起。而这正是巴文克置身其中的传统，也是作为其中最优秀的一员的巴文克，所要向我们传递的。

二、温和的尊重：巴文克神学大公性的精彩

但如此说来，我们还必须要澄清一点误解，那就是巴文克神学的大公性。在使徒信经中，有“我信圣而公之教会”一句。这里的“大公性”就是指对普世教会都适用的意思。但巴文克神学的大公性，不单是对教会内的人而言，也包括教会外的人。且让我们细细道来。

我们再来看看这本书的书名，繁体中文叫做《基督教神学》，给人的感觉是代表面很广。但我们已经知道，它其实是《改革宗教义》的缩写本。翻阅本书其他几则序言，都是没做任何解释就直言其改革宗神学的特点，这似乎给人以改革宗神学唯我独尊的印象。其实不然，这又是极大的误解。因为与其他诸多改革宗神学的“悍将”比起来，巴文克显然要“温和”得多。不过我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温和”需要进一步诠释。

怎么说呢？因为今天似乎有一种倾向，就是凡将“温和”二字加在一个名词前面时，那这个名词所代表的东西就要打点折扣。因此，“温和的改革宗”，就意味着不那么彻底的改革宗，就像“温和的基督教”即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不那么彻底委身的基督教一样。但巴文克的温和绝对不是这种意思，而是体现在对不同看法的尊重，即使他最终并不同意那种看法。换句话说，巴文克的温和其实是一种学术大家的风范，对领域内的各种看法都有透彻的了解，同时又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神学上，体现为即对各种神学传统深入了解，同时又持定自己的改革宗信仰宣言。许多巴文克的读者都评论说，读他的《改革宗教义》，同时也是在读教义史。他尽量在所评论的每种看法中发现上帝真理的成分，同时又基于圣经和信仰的立场对不合理的成分加以拒斥。这不论是对罗马天主教、路德会，甚至自由派的传统，还是对改革宗传统中的各种自我争辩，都是如此。

可惜这一点在这部缩略本中不太容易看出来。这是情有可原的。因为

^① 据 Dosker 的记载，事实上巴文克自己说出了这个词。“Bavinck”，PTR, 1922, reprinted in *Essays on Religion, Science and Society*, John Bolt ed. Grand Rapids, MI: Baker Academic, 2008.

就像我常打的一个比喻：无论我们要强调少林、武当等各门各派之间有多大差别，但对初学者来说，基本的招式和架子都是一样的。或许在《改革宗教义》中，巴文克有充沛的时间和精力来阐述为何他相信改革宗传统是最合乎圣经、最忠于大公教会的传统，但在这部缩略本中，巴文克显然相信，回到最基本的才是最重要的。这就是有人发现，这部缩略本似乎比那套巨著引用圣经更多的原因。其实当然不是巴文克在那套巨著中对圣经的重要性有任何忽视，而是巴文克似乎透过这部缩略本告诉我们，在他那浩如烟海的讨论当中，对他来说什么才是真正的重要和核心。所以我们可以说，巴文克虽然在这本书中采取的是改革宗传统的神学架构，但所呈现的绝不是某种狭隘的宗派主义神学，而是真正大公教会神学的精髓。从这个角度说，中文繁体版把书名定为《基督教神学》，倒也不为过。

巴文克神学的大公性，不单单是他深厚学术修养的体现，更是他基于信仰的深刻表达。话说到最后，我们终究是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弗4:5-6），因此我们的神学最终必须是大公的。有意思的是，这并没有让巴文克最后离开自己的改革宗神学传统，反而在很多方面进一步丰富和推进了它的发展。这在他的盟约神学、与基督联合等话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很多方面甚至超前他的时代。举两个简单例子。霍智恒（Geerhardus Vos）的圣经神学和范泰尔（Cornelius van Til）的前提护教学，皆可谓改革宗神学近来最重要的发展。但你有时不禁会私下里琢磨，这两位巨人究竟是从哪里发展出他们那些精彩思想的，读读巴文克你就知道了。甚至就近年来一直吵得让人有点疲倦的关于圣经权威和默示的争辩，巴文克提供的思路，仍难找到与之匹敌的其他选择。当然，这些东西我们可能要去读《改革宗教义》才会觉得更酣畅，但这部缩略本至少可以让我们略尝甘味。

因此，巴文克神学的大公性，即不表示对大公教会其他传统的蔑视，也不意味着对自己立场的妥协。这是真正建立在圣经基础之上的、在健康合一之下的健康多元，既非武断地打击一切异己，也非一厢情愿地相对化一切真理。

巴文克神学大公性的精彩不仅体现于教会内的神学建造，它同样还体现在基督教与非基督教的关系上。如果说，因为我们共有一位主、一位神，所以我们的神学必须是大而公的话，那么因为我们的这位主、这位神同时又是天地的主、创造者神，所以我们的神学就不单单只针对教会内的信徒适用，也是要给普天下之人的信息。或者说，既然神学是信仰的反思，而信仰的内容至终又不是个人或一部分人的自娱自乐，而是要向普天下之人宣告的大好信息，那么，我们的神学至少在原则上必须处理与教会之外的世界的关系。对神的知识固然必须与其他知识区分开来，但这种区分必须不是一种并列式的，就好像物理学与生物学一样，而是必须寻求一种更整全的关系。

从教义编排上来说，这类问题一般在所谓的神学导论中处理。在本书中，全部二十四章中的前八章，对应于四卷《教义》的第一卷。如果读者对一般的教义著作些微熟悉的话，立刻就会意识到巴文克在这里的处理要详尽得多。这其实是新加尔文主义的一个特点。与凯波尔类似的处理比较起来，巴文克或许没有那么大胆，但其原创性也足以让许多固步自封的人士紧张。与另外一些鲁莽之辈比较起来，巴文克的学养又让他们知道该在什么地方保持沉默。更重要的是，他无时不刻不体现出从圣经出发的思考模式。比如说，对外邦宗教的评论，不仅出现在对普遍启示的讨论中，而且在神论、人论、基督论、救恩论等的讨论中都不断出现。换句话说，巴文克在建构他的整个神学体系时，脑海中从来都不只是有教会的信徒，同时也兼顾到对普世之人的关照。

至此，大使命就不再是一个额外的附加行为，而是融入在整个神学的血脉之中。与传统敬虔式的消极避世比较起来，巴文克显然在这里提供了一个更积极、更符合圣经的修正。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因此被统一在一个更全面、更稳固的根基之上：那位创造之神，同时也是救赎之神；反之亦然，那位救赎的主，同时也是创造的主。

“上帝，唯独上帝，才是人之至善。”

三、为什么读巴文克？

因此，读巴文克不单可以在神学基础知识上装备我们，也能对我们如何做神学提供指引。学习神学应该采取什么方法呢？让我们用两段加西亚（Mark Garcia）的书评^①作结。首先，我们的神学方法应该有：

对耐心解经的持续委身，与历史详实负责任的互动，对教会处境的敏感，以及对当代关注 and 需要的敏锐觉察。

如果我们可以坚持如此，或许有一天就可以体会到：

信心转化为惊叹，知识止步于景仰；而他们的告白则成为赞美和感恩之歌。这就是神学谈论关于上帝的知识的目标。它不仅只是知道，更不单是了解，它比一切更好、更荣耀；它是那称之为生命的知识，就是“永生”（约 17:3）。

谨识于北京

2010/10/13

^① Mark Garcia, “A Spiritual Feast Review of the first two volumes of Dogmatics”, OPC Ordained Servant Online, online: http://opc.org/oshtml?article_id=57, 2010-10-10 读取。



001	英译者序	你不可不知的巴文克 / 亨利·锡尔斯塔
007	汉译者序	在真道上有根有基 / 赵中辉
009	中文版序	信仰告白：赞美和感恩之歌 / 赵刚

第 1 章 | 人之至善 001

001	1. 人之至善就是上帝，仅靠物质世界不能满足人
003	2. 科学、哲学、艺术、道德都不是满足人的至善
005	3. 人心如果不在上帝里面，就得不到安息

第 2 章 | 有关上帝的知识 006

006	1. 整本圣经都在见证上帝是人所追求的至善
008	2. 有关上帝的知识，其起源、内容和本质不同于其他知识

第 3 章 | 普遍启示 012

012	1. 唯独在上帝启示的范围内人才能认识上帝
013	2. 上帝启示的来源、内容与目的
016	3. 上帝的启示有普遍与特殊之分
016	4. 普遍启示：上帝在自然、历史中启示自己
019	5. 上帝不仅在人以外也在人心里启示他自己